



□朵拉[马来西亚]

扬州慢

□夏学杰

生病的意义

匈牙利作家马洛伊·山多尔说:生病就是休息。马洛伊·山多尔在《草叶集》一书中写道:在生活无休止的竞争中,多数人只在生病时休息一会儿。生病,用法国诗人的话说,不仅是穷人的旅行,更是穷人的休闲,是冬季的里维埃拉,塔特拉山,或是埃及。为迎合火热的气氛,疾病往往会带来真正的发烧,以便让人稍事休息。胸怀大志或永不满足的人——比如诗人克莱斯特——“不断地辗转于城市之间,就像热病选择床榻”,他们只能在病床上思考真正的欲望和无法实现的激情。

作家就是作家,总是喜欢抒情,就连发烧在他笔下也变得不那么令人生厌了。事实上,发烧可不是什么好事,人一发烧就头昏脑胀,连饭都吃不下了。正因如此,你要遵循大自然的指示,接受必不可少的病假,在你的生活节奏中插入一小段精妙的生病之旅,好好休息。有时即便健康状况极佳,也要在床上一躺一两天吧。你的心脏不会因为尼古丁而抽搐:在自愿的情况下,远离香烟三天,对你有好处。最低限度地关注你的身体器官,这会把它相当放松!这些微妙的、完全自主的生病或痊愈的状态,自发的节食,完全抽离,好好休息的方式类似东方的传统,或是像进行了一次盲肠手术。试试看,你会发现很神奇。

生病是休息,但是,前提是生病。正如鲁迅所言:“生一点病,的确也是一种福气。不过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要病是生病,并非什么霍乱吐泻,黑死病,或脑膜炎之类;二要至少手头有一点现款,不至于躺一天,就饿一天。这二者缺一,便是俗人。不足与言生病之雅趣的。”

生了大病,那根本就不休息,而是遭罪。并且,就连感冒重的时候,也不是休息,而是痛苦的折磨。我觉得生病的意义在于报警。报什么警?——不是平时饮食有问题,起居有问题,是不是工作过于劳累,是不是平时惯于生闷气……有些行为与习惯该改进了。生了胃病,以后就少吃生冷辛辣的;工作太拼,透支身体了,以后就悠着点,如抽烟就戒烟,如喝酒就戒酒。

我觉得,这是生病最现实的意义。当然,人们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戒酒没几天,见病好了,就又猛喝起来。有时,不是烟酒难忌,也不是有些人天生就对烟酒上瘾,只是他们缺乏自控力。不怕你偶尔犯错,就怕你一错再错,一条道走到黑。

阿来说:“如果说生病有什么正面的意义,那就是让自己与好多无意义的事情隔绝了。可以静心读书,也可以让那些有意思的念头在心中生长。”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我觉得,生病的意义在于修整。检视错误,并思考:在自己的人生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小窗幽记》言:“人在病中,百念灰冷。虽有富贵,欲享不可,反羡贫贱而健者。是故人能于无事时常作病想,一切名利之心,自然扫去也。”

诚哉斯言!我已经历了好多回自己和家人的病痛折磨,自己深有感触。当生了重病之时,就会发觉,除了健康,什么都不重要了,因为其他都可以舍弃。只要有健康的身体,贫穷一点又有何关系,四处碰壁亦无妨。滴水都很难下咽时,看到那些狼吞虎咽地吃着粗茶淡饭者,会艳羡得不得了,即便那些是你平日很不愿意吃的粗茶淡饭。



因为一座城,你很想去爱一个人。来到扬州,发现自己迟到了。要是再年轻一些,那一定要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到扬州来谈一场恋爱。成功或失败并不重要,神往的是可以享受美好温柔的扬州慢。

那天上午,慢悠悠地,从街头走到巷尾;下午,又慢悠悠地,从巷尾走到街头。一个适宜漫步,慢走,缓缓地看着,细细地感觉的城市。不管你抬眼或低眉,左瞧或右望,入眼就见唐诗和宋词。

已经五月,仍是花开季,写了“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的李白早在千年前约我们春暖时分到扬州,阳历五月,也算农历三月吧。烟花五月下扬州,春花绚烂绽开时,潋滟细雨中,迷离雨雾间,宋人王观的《卜算子》浮上心头:“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那边?眉眼盈盈处。才始送春归,又送君归去。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王观送友人鲍浩然到浙东的词,没写扬州,然而,也许有一句,“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令人向往,到扬州遇上春天,一定要在扬州住下,从容地和春天面对面相见。

早上先在瘦西湖边散步。住在瘦西湖畔,出了大门,往左拐,直走,就见瘦西湖入门处的人潮一如

想象中的拥挤。大多是来自外地的游客。带我们的小鱼儿说,“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是个幻境,我们前一天坐车来的,身边也没多少钱。至于那些中国游客,腰包里装的是手机,钱在支付宝里,付费都不用现金。

到扬州大学正门口的柳湖茶坊喝早茶,一进门见座无空席,打破了我一直以为只有广州和香港人才有饮早茶吃点心的习惯思维,原来扬州人的老话里早就有“早上皮包水”的享受。店里最著名的大煮干丝,少见多怪的南洋人以为是黄色面条,却是淮扬菜系中的看家菜。还有最具特色的蟹黄汤包,所谓的“皮包水”指的正是这一碗“轻提慢移,先开窗,后喝汤”的汤包,每碗一个汤包配一个吸管,吃的时候先戳破汤包皮,把饱含蟹黄和猪肉汁的鲜美汤水吸个清光,就吃好了。因为汤水才是这道菜的主题,包子皮不吃。要吃包子,好客的吴教授点了大汤包、五丁包,荠菜包等共三种大包子,还有小汤包、牛肉、镇江肴肉、香葱、水饺等。其中五丁包为鸡丁、猪肉丁、虾仁丁、海参丁加笋丁,拌上卤汁,包在一起。据说当年日本天皇吃过后赞赏为“天下一品”。

扬州的名菜还有苏东坡吃过

大呼“值那一死”的白烧河豚。清明节前吃刀鱼,刀鱼倒吃了,真是好吃。清明节后吃河豚。扬州人把刀鱼当“人间美味”,对河豚的赞语是“人间至味”,更高一级,更胜一筹。“一朝食得河豚肉,终生不念天下鱼”就是用来歌颂河豚的。中国古语“拼死吃河豚”意思是怀有剧毒的河豚,万一处理不当,吃的人就要客死扬州了。唐朝诗人张祜来到扬州爱上扬州,爱得打算死在扬州:“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诗不是我写的,我也还想活着,活着再来看扬州,扬州只来一次,两次,那是不够的。

穿过扬州大学校园,回到酒店门口,领路的小鱼儿已在等待。随着她走进斜风细雨里,刻意不打伞,给自己制造浪漫感觉。扬州风光正是如此妩媚旖旎。瘦瘦的湖水在身边,翠绿的柳树伫岸边,姹紫嫣红的鲜花在路边,湿润潮湿空气里有花香味。

邀请我们到扬州大学演讲的柏老师,带着我们行走扬州小巷子的小鱼儿,都不是真正的扬州当地人。然而,她们来到多江多河多湖多水的扬州,工作,住下,再也不想走。作为游客的南洋人,对她们的热情招待心存感激,但当我直接坦诚告

硬写不来的“唐诗”

□唐朝人

技术层面还较容易,难就难在韵味、古意等。如果少了韵味、古意,不就跟顺口溜差不多了吗?所以,鲁迅先生就曾说过:既然唐人已将古诗写尽,今人就大可不必再去写它(大意)。先生的意思是说,既然你再写不过古人,又何必硬去写呢?

的确,唐朝是个诗的国度,数不清的诗人天天都在写诗,写了几百年,什么题材不被掏光了?什么好诗好句不被写尽了?你再有本事怕也无力为了。更要紧的是,人家生活在“诗化”的朝代,你生活在“现代化”的时

代,历史、家境都不同,就浸淫不出那古意古味来,也就写不出“唐诗”了,更写不好“唐诗”了。看来,鲁迅是给那些为硬着头皮也写不出唐诗而苦恼的人兜头泼了一瓢凉水。仔细一想,这瓢凉水泼得无情而有理。那么,是不是反对今人学写古诗或者否定今人写的古诗呢?那也不是。只不过是理性的告诫罢了。爱好写古诗,就写点自娱自乐吧,千万别过度自我欣赏,更不要以为再写八百一千年,说不定自己又是一位著名的“古诗人”了。

韵味、古意固不易,然就算有那么一点点,如果缺少了古人那氛围、气质,尤其是后者,怕也写不好古诗。比如没有盛唐能出李杜吗?进而,若缺少李白那天性、异禀,就更不可能有“诗仙”了。且不说当今诗人,中晚唐有位诗人徐凝,他看到李白的《望

庐山瀑布》影响很大,就手痒痒也来仿写一首《庐山瀑布》:“虚空落泉千仞直,雷奔入江不暂息。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弄破青山色。”孤立地看,应该说诗还是不赖的。但若拿来与李白的“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比,读了简直让人要哭!难怪北宋苏轼看了直皱眉头,提笔就写了一诗以晒之:“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惟有谪仙词。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为徐凝洗恶诗。”不要以为徐凝不能诗,他有一首《忆扬州》可是天下闻名:“萧娘轻薄难胜泪,柳叶眉长易觉愁。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诗的后二句更是传诵不衰的千古名句。正如清代吴修坞评李白的《静夜思》时说的:“此信口语,后人不能摹拟。摹拟便丑。”

童年的秋天

□陈雄昌

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凉爽伴随着秋天来临,当闻着秋风带来泥土的气息,就记起小时候的日子。

晚风吹来,寂静、闲静、安静。我们来到大操场,躺在草地上仰望夜空,满天的星星镶嵌在空中,连眼都不眨,数了这边,又数那边,数也数不尽。童年的秋夜,天上的每颗星有一个童话,一个比一个神奇。

到了八月十五中秋节的晚上,金黄色的月亮挂在夜空中,特别大,特别圆。我们把在两天前就制做好的孔明灯,带到大操场放飞。这些孔明灯有大有小,用竹篾扎成圆架、方架,裱糊上柔韧的纸,灯笼底部横架的底盘上放置松脂,或用铁丝捆扎沾满豆油的布团。先点燃松脂或布团,灯笼内空气受热膨胀变轻,一放手,灯笼便冉冉上升,风向往哪里就飘向哪里,宛如一盏盏明灯闪烁于夜空。

小伙伴们三五成群,相邀相聚,或安静地玩耍,或张狂地疯跑,打打闹闹,每天都过得很快。晚上,围坐在墟里卖蔗地的两棵树下,或是墟廊的一角,轮流讲述新鲜的事儿,就是在开故事会。

讲完故事后,接着就是捉迷藏。石头、剪刀、布,谁输了就自觉用双手捂着眼睛,转几圈,分不清方向,然后大家四处躲藏,远远地向这个“捂眼人”呼喊一声“好”,于是,捂眼人开始追捕,大家借着墟廊用煤油点着的几盏微弱的路灯东躲西藏。

墟里有人在院子里种上番石榴树,附近的涌基上也有番石榴树,在番石榴采摘的时候,就有大人小孩围在树下。番石榴(俗称鸡屎果)是一种常见的水果,味很好,甘甜汁水饱满,口感嫩滑。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田野里一片片金黄色的稻子,大地像铺上了一张很大的金黄色地毯。禾稻收割了,我和同龄的伙伴一样,每天下午放学回家放下书包,就拿起篮子到田里拾穗稻,如果是星期天,我们就早早到田里去。在田里,我们看打过禾的“禾秆人”里边有没有藏着稻穗,因为割下的禾把有长有短,虽然在禾桶打过了,也有漏打的。我们还跟在割禾打禾的阿叔阿姨后面,拾那些断落的一串半串稻穗。我们把拾到的稻穗用竹篾穿或藤窝放在门口晒干,用手搓脱出谷子。拾到的稻穗,集腋成裘,一箩半箩,再拿到粮食碾米厂碾米。

秋风送来一阵阵浓郁的桂花香,我仿佛找回了远去的童年秋天。

东湖旅店

□陈雪

东湖旅店前身不叫东湖旅店,而是惠州绅士翟雨亭的私人别墅。这座建于1935年的欧陆建筑雄踞于繁华的东平大街之上,在一排排骑楼中间醒目而耀眼。高大的门面,宽阔的开间,幽静的花园和别具异域风格的豪华装饰,充分显示出主人的殷实和品位。即使是在今天看来,处在高楼大厦夹缝中的它,仍然不觉得落伍。

这位毕业于广东高等师范学堂的翟雨亭先生,曾有一个庞大的实业报国计划,他在创办建筑公司,参与惠樟公路修建的同时,还梦想建设一大批经典建筑,作为西湖的配套景点,来点缀装扮这座古城。1938年,日本侵略者攻占惠州后,桥东木楼在火海中三日不灭,唯有这座钢筋水泥的建筑,劫后余生地耸立在水东大街上。

惠州城是一座有着16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又是东江流域繁华的商贸之地。东湖旅店毗江临街,水陆便利,实为黄金地带。我们尽可以想象,70多年前的桥东大街是何等盛景:骑楼鳞次栉比,商号依次排列;街市上行人熙攘,店家酒旗飘扬。身着长袍大袖,峨冠博带的商贸大亨,一身短衫的水手挑夫,在小贩的叫卖吆喝声中,步履匆匆;码头上货物成山,人来人往;江上帆船林立,舟楫相接。一到夜晚,桅灯高照,水上千户人家,岸上万家灯火,涛声、人声交织相映,那是一幅多么令人神往的清明上河图……可恨的是,日本侵略者一把大火把这幅“上河图”烧得千疮百孔,也把翟雨亭酝酿已久的建设蓝图烧成灰烬。当他把这座别具一格的欧陆建筑改成东湖旅店之后,他一定没有想到,小小的一家旅馆,会与中国抗战史上一次最伟大的抢救行动结下不解之缘。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坚持了十八天的香港保卫战以失败告终。当港督杨慕琦向日本侵略者降下白旗时,香港不再是“东方之珠”。党中央、南方局一直在关注着香港战局和在港的民主人士的安危。一封封加急电报,从延安、重庆不断地打到香港皇后大道五号,在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和南方工委的缜密部署下,一场抢救文化人的大行动,旋即在香港澳地区全面开展。

四条转移路线,两条跨海,两条水陆并举。由于日军控制了海域和渡船,八路军办事处与广东地方党组织选来选去,都只有选择东江经过惠州这条线路最为稳妥。虽然这条线路最长,关卡最多,日、伪、顽、匪最集中,但经廖承志、连贯、乔冠华实地考察,这条线路的有利条件也不少:一有健全的地下党组织,二有东江游击队的坚强武装,三有良好的统战工作基础。最危险也最安全,虎口拔牙,将计就计,租下东湖旅店这个要塞之地作为秘密中转站。

于是,地下党员卢伟如作为香港昌业公司老板的身份,住进了东湖旅店;廖安祥带着廖承志的密令来惠州开办“源吉行”,秘密协助卢伟如开展工作。从1942年1月初开始,第一批文化人茅盾夫妇、胡绳夫妇、戈宝权等20余人在1942年的除夕夜,来到东湖旅店,接着是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第五批,邹韬奋是最后一位来到惠州的贵客,国民党在通缉令中申明:“可就地惩处”。惠州地方党组织、东江游击队为了保证他的绝对安全,为他改名李尚清,由陈永及卢伟如的妻子陪伴他“早出晚归”,躲过了敌人的一次次搜捕和追索。

短短的几个月,200余位文化名人从宝安白石龙来到惠州,在东湖旅店秘密中转,再沿江北上,陆续转至大后方。一段艰难而惊险的经历,让一大批文化名人写下了诸多的回忆录。

东湖旅店历经了七十多年的风雨岁月,没有苍老,历久弥新。尽管水东街今日的风物楼宇,已与当年殊异,但流淌的江水仍然有一条写满记忆的河床,泛起的浪花正是永不沉寂、脉脉跳动的红色基因,这曲生命的礼赞早已融进了共和国七十年华诞的雄浑旋律之中。

本版制图/范英兰

父亲的钎担

□杨德振

2019年清明节前后,我回到湖北省麻城市最北面、也是大别山南麓的福田镇杨家河小山村,整修加固了百多年历史的老宅子。在昏暗潮湿的老宅子里,存放着几代人曾“刀耕火种”的各种农具和器皿,最多的物件是油光发亮的上釉大缸,估计有一、二百年的历史,称得上是我们家族中的“古董”了;其次,最多的便是几代人用过的钎担和扁担。看到钎担和扁担,便勾起了我儿时的记忆。

钎担一般是用笔直的柏树刨光皮、晾干打磨来做的,大概长1.8米、两头用尖尖的铁皮包裹着,主要用于挑柴火、稻谷与麦子的草把,粗一点的钎担能挑三百多斤的柴火,细一点的钎担也能挑一两百斤,它是农村里最为常见的劳动工具,也是家中数代男人担负起兴家责任的最主要农具。可以说,一个家庭的兴旺与发达改变,大部分是靠钎担“挑”出来的;有的家庭用钎担“挑”出了儿孙满堂、富贵吉祥、幸福绵长;有的家庭用钎担“挑”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和美好的未来。

我父亲是个无师自通的木匠,给自己打造了多根钎担。在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专门给我也精心准备了一根钎担,仅钎担的重量就有十几斤。

钎担做好后,他带我去十几公里外的大山上砍柴。十岁的我,稚嫩的小肩膀上扛着一根大钎担,开始觉得很新鲜,觉得自己长大了、有力气了,“长本事了”、“很了不起”;走着走着,就蔫了一半,穿着破鞋子,用草绳捆住,脚上已磨出一层泡,走路磨得生痛,一瘸一瘸的,觉得肩上的钎担也越来越沉。

到了大山上,看到很多干柴火,拣起来堆在一堆,把它捆成两大捆,父亲用钎担铨进去,扶在我肩上。我挑起来就下山往回走,走不到两里,感觉挑不动了,歇了一会儿,口干舌燥,跑到小河沟,趴下痛快地把山泉喝了个饱。

父亲挑着柴火往前走,叫我跟上;跟着跟着,慢慢见不到父亲的背影了,我又停下来歇口气,趁机抽掉几根棍子,减轻一下重量,接着又去追赶父亲。

大概走了五、六里,父亲也在前面

停下来歇气,顺便等我,见到我满脸通红、大汗淋漓,父亲递过来已是湿透了的白大布毛巾,让我擦把汗。擦完汗,我再细看父亲的钎担上,一头大概有一百多斤一捆的柴火,两边加起来,起码有二百六十多斤。他起身挑起来的时候,只见钎担两头朝下耷,发出“吱、吱”声,走起路来时,“吱吱嘎嘎”响个不停,韵律感十足。

我跟在后头,也想找到“吱吱嘎嘎”韵律感,无奈我的钎担硬邦邦的,发不出任何响声,步履也找不到节奏。直到现在,我才明白,挑的东西太轻,钎担是“不高兴”的,它是不会唱歌的。父亲能够让钎担“唱歌”,唱的是负重之歌,也是一家人的“希望之歌”、“幸福之歌”。

在蜿蜒崎岖山路上跟着跟着,我又渐渐看不见父亲的背影了,害怕、疲倦和无助一齐袭来,我陡然噘泣起来……在荒野里哭泣没人理,也没有用,除了几只乌鸦在树梢上“看热闹”叫个不停外,还有就是阵阵一阵一阵的凄厉风声。这个时候,我对钎担产生了深深的畏惧和恨意,怪父亲把钎担做得这么“硬朗”、“结实”,“沉得”使我白嫩的双肩像擦了红汞似的,一阵又一阵地发烧。在离村子还有五里的地方,爷爷突然出现了,他是专门来接我的。回到家中,爷爷用秤一称柴火,还有48斤;如果加上钎担重量,就有六十多斤了;如果不是在路上“卸货”,恐怕整担柴火七八十斤重了。

上世纪八十年初期,我到了十五六岁的年纪,已经能够轻车熟路地使用钎担了,也能够像父亲一样上山砍柴,挑一两百斤的柴火。作为家中老大,我用钎担承担了父亲的一部分责任。高一、高二读书期间,我的学费和给学校上交的每学期380斤柴火任务,都是我自用钎担完成的,没有给父亲和家庭加重负担;那时候,一百斤活柴挑走三十里路卖九角钱……

如今细想,我今天的幸福生活不正是那时用钎担“挑”出来的吗?没有钎担的“压榨”与磨砺,没有钎担的“鞭策”与敲打,就没有改变命运的强烈渴望。从这一点出发,我要感谢严厉的父亲!还要感谢“沉默无言”的钎担!



硃竹生辉

□徐海燕